

两岸交流 30 年：回顾与省思

□ 严安林

摘要：自 1987 年 11 月两岸开启人员交流之后，30 年来两岸各方面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呈现出两岸交流的“趋势性”特征明显、交流本质的“人民主体性”日益显现、交流所产生的“双重性影响”同时存在以及交流的“不平衡性”始终存在四个基本特征；但也面临着政治因素不断制约两岸交流深化、两岸社会间矛盾日益显现、两岸交流热络但交心不足等问题。回顾海峡两岸交流 30 年的历程可以发现，两岸交流所产生的积极与正面作用不容低估，但两岸交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同时应充分估计到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复杂性以及两岸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大陆在两岸交流中不仅需要始终坚持一中原则，而且需要在具体对台工作中实践一中原则。

关键词：海峡两岸；两岸交流；30 年；两岸关系

DOI:10.16650/j.cnki.xdtwyj.2017.05.001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两岸进行直接通商、通航与通邮的“三通”建议，迄今已 38 年。而自 1987 年 11 月台湾方面正式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两岸进入社会与人员的“实质性互动”以来，迄今也已 30 年。30 年来，两岸各方面交流取得巨大进展，但交流中产生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回顾与总结两岸全面交流 30 年的历程、经验和教训，对于未来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与和平统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30 年来两岸交流的进展及其特征

（一）30 年来两岸交流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30 年来两岸各方面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成就巨大，主要表现在：

1、两岸直接“三通”常态化。2008 年 12 月 15 日，海峡两岸正式实现了全面、直接与双向的“三通”。两岸之间由过去的“春节包机”“四节（春节、清明、端午与中秋）包机”与“周末包机”，到实现“包机常态化”，最终走向全面直航，并且搭乘人员由最初台商到台干、普通台胞，再扩大到大陆赴台游客等持有有效证件的一般大众，大大方便了两岸民众往来。两岸直接“三通”的实现使两岸由过去的“咫尺天涯，重重阻隔”发展成“天涯咫尺，处处通途”，为两岸各方面交流与合作修筑起了康庄大道。

2、两岸经济合作深入化。30 年来，台商赴大陆投资与两岸贸易由无到有，从小到大，

作者简介：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从间接到直接,截至2016年底,大陆累计批准台商投资项目近10万项,台商对大陆直接与间接投资估计超过2000亿美元;两岸年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随着“陆资入岛”,两岸彼此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开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交流与合作格局,两岸经贸关系进入一个全面交流合作的新时代。

3、两岸文教交流热络化。30年来,两岸文化交流领域不断拓展,由原先的卫生、体育、演艺、影视、文物、美术、文学、图书出版、交通、医药发展到教育、科技、新闻、青少年、旅游、农业、金融、宗教、法律、城市建设、环保、气象、园林、公证、工会、少数民族等各行各业;交流内容不断深化,形式不断多样化,向学术化、专业化、纵深化与特色化方向发展,并由单向交流走向双向交流。两岸文教交流热络化、深入化,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奠定扎实的文化、思想与精神基础。

4、两岸社会交往扩大化。从老兵返乡探亲而开启的两岸间经商、贸易、考察、旅游等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台湾同胞赴大陆累计超过1亿人次,大陆民众赴台也有1000万人次。特别是《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的签署为两岸交流交往开启新的局面,不仅标志着两岸民众间往来的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使两岸人员往来进入一个直接、全面与双向的新时代,而且大大密切两岸民众间的情感,加速了两岸社会融合的进程。

5、两岸政治交往取得突破性进展。2014年2月,时任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王郁琦首度举行“张王会”,实现了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的首次会晤。201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正式举行举世瞩目的“习马会”。这是自1949年两岸分隔

66年来两岸领导人的首度会晤,是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是两岸政治交往的新高点和里程碑。

(二) 30年来两岸交流的基本特征

30年来特别是2008年5月两岸“大交流时代”开启以来,两岸之间的交流发展迅猛,呈现出四个明显的基本特征:

1、两岸交流的“趋势性”特征明显。30年来,两岸交流的发展态势不可阻挡,更不可逆转,不仅是两岸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方面交流的速度、进度与广度空前,而且交流的深度与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2、两岸交流本质的“人民主体性”日益显现。两岸关系说到底,就是两岸人民之间的关系,30年来,两岸关系中人员交流的特征日益显现;同时,交流成果也为两岸民众所享有,这是两岸交流富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3、两岸交流所产生的“双重性影响”同时存在。30年来,两岸交流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很大,但交流中出现与面临的消极性问题与影响也不小。总体上看,两岸交流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要远远大于消极作用,正面影响要远远大于负面影响。但在当前的网络时代背景下,加上台湾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等因素,两岸交流中出现的“社会对立”现象值得关注。

4、两岸交流的“不平衡性”始终存在。一是交流层面的“不平衡性”。经过30年全面交流,两岸经济关系应该已进入“融合”阶段,但两岸社会关系尚处于“汇合”或“磨合”阶段,而两岸政治关系则还在“竞合”之中。二是交流领域的“不平衡性”。如政党交流中,国共两党交流领先,起引导性作用;民共两党之间交流则是还没有正式启动。又如,经济交流与合作领先于政治层面的交流;新闻交流事实上落后于两岸关系发展实际,属于“起步早、进展慢”。再如,文化交

流中演艺活动多,价值探讨少;文化创意产业交流与合作多,而精神层面交流少。三是交流地区的“不平衡性”。两岸交流中的南北、东西差异客观存在,大陆与台湾北部、中部交流多,与南部交流相对不足,台湾与大陆东南沿海交流多,与西北、东北交流相对较少;台湾民众到大陆交流比较多,而大陆民众到台湾交流相对较少;等等。

二、30年来两岸交流中出现与面临的问题及其根源

(一) 两岸交流中出现与面临的问题

1、政治因素在不断地制约两岸交流的深化。不容否认,两岸关系中客观上存在着的政治分歧一直对两岸交流产生制约性的影响。特别是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关系中既有的“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局面面临严峻挑战。而两岸政治关系中事实上存在“政治竞合”的特征,导致两岸之间的政治交往始终面临很多障碍。

2、两岸交流中两个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近年来,两岸社会与民众因交流密切而产生的误解也开始增多。社会心态开始对两岸交流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台湾社会虽然有“走出去”的共识,但在“请进来”上却存在分歧,不仅是对大陆,即使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闭关自守的思维。其实“走出去”与“开放门户”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只要求对方开放市场,自己却反而“闭关绝市”。而随着大陆游客赴台游的进一步发展,两岸社会间的交往既有正面作用,也存在负面影响,包括“两岸官方和民间的缺乏互信”,“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和大陆民众的不良印象,未因两岸交流而获得改善”,^①甚至是“因了解而增加恶感”,^②在在都显示两岸社会交往尚处于“磨合”阶段,两岸社会融合仍然任重道远。

3、两岸之间交流热络,但交心不足。2008年以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践表明,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在不断深化,两岸“大交流”格局已然形成,但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并未因此而有所提升,相反却有进一步疏离的现象。突出表现是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认知比例在上升;台湾经济进一步依赖大陆,但台湾民众对经济依赖大陆的心理恐惧却不断增多,影响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度,从而使得两岸之间“共同认同”的建构仍然任重道远。

(二) 两岸交流中出现与面临问题的根源

1、台湾岛内政治局势的不断演变。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政治社会的演变表现为“民主化”与“本土化”的携手并进,“本土意识”迅猛发展,再加上民进党等“台独”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使得台湾社会出现了要求改变两岸现状的政治力量。而岛内这一政治局势的演变又几乎是与两岸关系的缓和同步进行的,从而使两岸关系表现为:一方面,两岸在经济、文化与民间社会的交流与合作日趋深化;但另一方面,两岸双方在政治立场上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交集点也是越来越少。两岸关系中出现这种“政经分离”现象的原因,不在于这现象的本身,也不在于两岸关系的交往及其程度如何,而在于台湾岛内政治局势的演变要远远超过两岸经济与社会整合的速度与力量。这就导致在两岸关系上出现了两种力量的并存与相互对立:由两岸交流与合作而产生的整合的力量,希望推动两岸政治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是促进两岸“和”与“合”的力量;而台湾岛内政治局势演变中产生的主张“分离”的力量,不希望两岸走向整合,是主张两岸“分”的力量。30年来,两岸交流便是始终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自然产生不少负面影响。

2、两岸百年分离的历史因素。自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以后，两岸隔绝了50年之久。1945年台湾光复后，两岸只有短短5年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其中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及国共内战。1949年后两岸之间的军事对峙与政治对立持续了近40年，直到1987年后两岸才出现有限度的往来，实现“三通”迄今也只有短短9年时间。两岸百年的分离，事实上使得双方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期间，台湾与美国、日本的关系远比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来得密切。马英九在2010年元旦祝词时就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分享与传承共同的血缘、语言、历史与文化，但海峡两岸隔海‘分治’迄今已经60年，期间各自采取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与经验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要在短时期内实现两岸正常交往难度颇大。

3、马英九执政后国民党政策论述的巨大矛盾。从2008年马英九上任以来在文化、教育政策与台湾整体发展方向战略规划中，没有看到要强化两岸认同的这一块，反而接受了李登辉、陈水扁的“台湾主体论述”，以强化“台湾主体性”的“不统、不独、不武”作为两岸政策的基调。因此，台湾学者杨开煌批评国民党，由于认同上的矛盾，国民党陷入政策论述上的巨大矛盾，表现在“经济政策跟北京要”，“在政治论述上是跟着民进党走。”“国民党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建立起可以跟民进党对抗的‘主体论述’，也就是没有建立起跟民进党对抗的认同观。”这就导致在两岸关系中，国民党实际上是“用封闭的心态谈开放的政策”，“用对抗的心态谈合作”与“用敌对的心态谈和平”。^③谢大宁也认为马英九在认同问题上，只会不停地向绿那边倾斜，“可以说这是马的个人特质使然，但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国民党已然丧失灵魂所致，当然归根究

底，这是台湾政治现实、各方力量拉扯、综合作用的结果。”因为马英九团队在两岸关系中只敢碰经济，所以“逐渐将两岸关系物质化了。”^④

4、民进党等“台独”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台湾学者张亚中认为“认同往往是被政治人物所建构。认同往往也作为区别我群与他群的判定标准。”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政客推动的政治运动，“强化‘台湾主体性’的包装，作为走向‘台独’的野心，使得一个中国在台湾变得妖魔化”。^⑤杨开煌指出：“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从过去政权的仇恨关系，已经蜕变为社会的敌对关系，双方的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充满敌意蔑视和防范，但又无可奈何地面对历史和现实的纠葛。”^⑥周志杰认为两岸社会交往产生问题的原因很多，包括“两岸民众因政治矛盾、价值差距、历史隔阂、政客灌输所积累的对立情绪与不信任感未消”，“现实交流过程中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的群体与个人亦滋生新的不信任与不安全感”，“两岸仍持续在传媒与教育体系中‘妖魔化’彼此的制度、价值与史观”，“政治菁英亦须投民意所好，以巩固执政基本盘而无意匡正。”^⑦

5、两岸交流中“物质化”现象的影响。台湾民众“中国认同”危机的原因，固然与台湾社会30年来的本土化、“台湾主体意识”上升有关，但恐怕也与30年来两岸交流中的过度“物质化”有关及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有关。部分中国大陆民众认为是“大陆一味让利，台湾见利忘义”。台湾学者认为，大陆采取的各种惠台政策，实际上也是在把两岸关系“物质化”。大陆希望通过惠台政策与强化交流，逐渐改变岛内对抗性的“台湾认同”，促进两岸的统合。但惠台政策存在的问题是：施惠于台湾农民的政策，因为台湾农产品的

“产销分离”，掌握运销流程者可以因此获利，多数农民则是既不受益也不了解。而对于台湾企业家而言，多数人倾向于“利益归利益，认同归认同”，“钱照赚，立场照旧”。^⑧两岸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中，经济一直是充满活力与生命力，即使是文化交流，也往往是文化产业优先，两岸文化、意识、共同价值的交流则是相对滞后，两岸文化交流似乎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婢女”，不少地方的“招商引资”一直存在“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不正常现象。两岸交流政策“物质化”的“结果，事实上不会形成有利于两岸整合的真正推动力量”。^⑨因为，“从古今中外来看，历史和现实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力的事实，来证明经济联系的加强必然导致政治关系的同向增长”。^⑩因此，目前两岸关系中出现的两岸交流的“物质化”倾向需要加以注意与避免，两岸关系发展也需要精神化与文明化，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需要，“两手都要硬”。台湾学者蔡玮提出“两岸已经在物质层面达成合作协议框架，今后更应着重文化精神层面的合作，当前两岸除了政治上的互信不足之外，台湾年青一代受到‘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整体价值观念似有转变现象，如何加强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由求同存异进一步走向求同化异，形塑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将是未来努力的目标。”^⑪

6、两岸实际往来中产生了“你群”与“我群”之别。林浊水认为，由于“三通”得以实现，两岸密切往来，需要把彼此的权利义务规定清楚，就涉及法律的管辖权问题。而两岸事实上是“两个法律主体”，所以，交流的结果是“两岸越往来，彼此往来越密切，台湾的‘主体性’也会越来越清楚。”^⑫也有台湾学者指出：由于每次去大陆都要签注，“加深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的心理距离。”^⑬

三、对30年来两岸交流的省思

(一) 两岸交流所产生的积极与正面作用不容低估

两岸经过30年的交流，“三通”的实现，经济融合、文化交融与社会、人员的交往，都为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与坚定的民意支持，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为此，需要充分把握两岸交流大势，推动两岸交流的深化与细化，不断提升交流实效。

1、把握发展大势。需要正确认识与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把握两岸交流合作趋势。尽管蔡英文上台使两岸交流出现不少问题与困难，但着眼未来，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性因素仍在增长，只有把握这一大势，才能顺势而为，有所作为。

2、明确交流方向。不仅要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要坚持推动两岸各层面交流的方向不动摇，明确交流要服务两岸民众、服务两岸和平发展的方向，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两岸关系的实际现状出发，求同存异，务实地推动两岸经济、文化、教育交流及人员往来等各方面的进展。

3、坚持以民为本。要确保两岸关系取得源源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落实与深化以民为本、为两岸民众谋福祉的施政理念则是根本的途径。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民生问题是两岸关系的重大问题。两岸关系的主体其实是两岸民众，两岸民众是两岸交流与合作中的“主角”，因此，在两岸交流中应进一步确立与贯彻“以民为本、为民谋利”的政治理念与政策措施，真正使两岸交流所产生的成果为两岸民众所共享。

4、深化交流渠道。开辟与扩大多渠道、多层次人员交流是加强两岸了解与理解、深化两岸交往的内在要求。

5、处理好几对关系。包括：加强两岸各

方面交流与把握交流节奏的关系；扩大交流数量与提升交流质量的关系；加强中央对台政策统筹与调动各地方对台工作积极性的关系；两岸交流发展红利的享有如何兼顾团体与一般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即如何让惠台政策更多地惠及台湾民众。

(二) 应充分估计到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复杂性

两岸经贸交流固然会对两岸关系产生诸多积极作用，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在两岸经贸合作的认知上，台湾内部与两岸之间存在五大落差：

1、两岸在经贸合作的政策目标上存在本质不同。大陆的政策目标总体是“以经济促政治”，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另一方面希望在经济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为最终统一奠定经济基础，创造条件，以让利为目的的惠台政策即本源于此。台湾方面的政策目标，国民党是期待大陆“输血台湾”，帮助台湾摆脱经济发展困境，同时谋求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避免台湾经济边缘化。因为在全球化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壮大的背景下，台湾经济发展无法自外于大陆，只有通过密切两岸经济关系，实现和平发展，才能提升台湾的经济竞争力，并以此作为“拒统”筹码。而民进党的认知是，两岸经贸合作是“输血大陆，台湾失血”，其结果是两岸不仅走向经济统一，而且最终将走向政治统一。

2、两岸对经济合作效果的期待不同。大陆推动两岸经贸合作所期待的最终结果是两岸密切的经贸关系能够促成台湾民众政治立场的变化，重构中国认同。而台湾方面特别是马英九与国民党所期待的两岸经贸合作则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政经分离”发展形态。

3、蓝、绿政治人物对两岸经贸合作的认知不同。台湾蓝营政治人物及支持民众认识到深化两岸经贸合作对台湾而言是别无选择的，大陆经济发展对台湾可能存在“威胁”，但也是机会，要努力将“机会最大化、危险最小化”。绿营政治人物及支持民众则认为两岸经济合作是“倾中卖台”，即使“陆资入岛”也是抢占台湾民众资源，进而控制台湾，因此大陆经济发展对台湾是“威胁”。

4、企业界人士与一般民众对两岸经贸合作的认知不同。台湾企业界特别是大企业界人士与从两岸经贸合作中获得实际利益的中小企业界人士，认识到对台湾而言，两岸经济合作是利之所在，是市场需求，是发展机遇。但台湾一般民众特别是与大陆没有关联度的民众则认为，两岸经济合作是台湾经济失血，个人也将失去工作，失去发展机会，特别是绿营选民对此的认知尤其强烈。

5、台湾不同世代之间对两岸经贸合作的认知不同。30岁以上的各个世代基于工作经历、阅历与个人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需要，对两岸经贸合作大体尚能秉持理性与客观的看法，但30岁以下的年轻世代，由于是在李登辉与陈水扁20年“去中国化”教育下成长起来及阅历、经历所限，不少人对两岸经贸合作的认知相对幼稚与冲动，认为两岸经贸合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守护“台湾主权”；两岸关系也不是最重要的，更非生活全部，第一位应该是“民主”的生活方式。认为两岸经贸合作导致了台湾经济的衰落与民众生活下降，两岸关系因素对台湾社会与经济而言是负面因素。“太阳花学运”的“主轴是反对、质疑两岸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希望透过设置层层障碍，减缓两岸经济整合的步伐”。^④

(三) 应充分估计到两岸社会发展存在的差异性

在30年来的两岸交流中，两岸社会发展的差异在不断显现，无论是制度差异、思维差异还是社会心理差异，都是客观存在的。包括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恐中”“恐共”心理。尽管台湾经济高度依赖大陆，包括赴台游的陆客消费都已经成为台湾“最主要经济成长动能”，但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了解却依然不足，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了解大陆，七成民众希望严格限制大陆钱潮、人潮入台”。台湾民众这样的社会心态，昭示着“两岸关系的进展缺乏社会心理层面的支撑。”^⑤对于包括大陆游客赴台游在内的两岸社会交往，应强化的是质的提升而非仅仅是量的扩张，应加以研究并设法克服两岸交流交往中出现的各种负面现象。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两岸社会发展存在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正视与面对这些差异。唯有正视这些差异，才能通过交流消弭差异。

（四）两岸交流中需要坚持一中原则，更需要实践一中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石。因此，大陆不仅要在两岸交流中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推进与落实一个中国原则，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两岸交流的积极与正面作用，最大限度地让两岸交流的成果惠及两岸同胞。大陆应在具体的对台政策层面更多地体现“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一中原则，给予来大陆发展的台湾同

胞享受同等的居民待遇，让更多台胞真正从两岸交流中获益。

注 释：

①赵春山 《累积互信，两岸和解关键》，台湾《联合报》，2013年9月24日，A15版。

②郭正亮 《交流扩大，因累积增恶感》，台湾《联合报》，2013年9月24日，A15版。

③④⑧⑨ 《思想者论坛——认同与两岸关系》，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9月号，第57、61、60-61、61页。

⑤⑫ 《思想者论坛——两岸未来十年愿景》，香港《中国评论》，2010年12月号，第60页。

⑥杨开煌 《期待马“总统”的两岸政策论述》，台湾《海峡评论》，2011年3月号，第50页。

⑦周志杰 《再寻两岸关系深化的动力》，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6月号，第13页。

⑩萧元恺 《台湾问题：政治解决策论》，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4页。

⑪蔡玮 《有关两岸文化合作的几点思考》，香港《中国评论》，2010年11月号，第8页。

⑬ 《思想者论坛——台湾青年如何看待两岸关系》，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6月号，第70页。

⑭社论 《“太阳花”没有改变台湾超稳定结构》，台湾《中国时报》，2014年9月27日，A23版。

⑮社评 《两岸关系7个社会心理矛盾》，台湾《旺报》，2013年8月8日，C5版。

（责任编辑：刘凌斌）